

· 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 ·

A History of HONG KONG

【英】弗兰克·韦尔什 (Frank Welsh) 著
王皖强 黄亚红 译

香港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 History of Hong Kong

【英】弗兰克·韦尔什 (Frank Welsh) 著
王皖强 黄亚红 译

香港史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史/(英)韦尔什著;王皖强,黄亚红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3

书名原文:A History of HONG KONG

ISBN 978-7-80211-432-6

I. 香... II. ①韦...②王...③黄... III. 香港—地方史
IV. K2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2383 号

香港史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130345(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720 千字

印 张:43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0.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鲁哈达

序

xi

我第一次对香港产生兴趣是在 1970 年。当时,我担任董事的一家伦敦银行收购了道亨银行,道亨银行是香港一家规模不小的华资银行,之后我到这个殖民地去了一趟。

不久,我家在 1972 年买下了弗拉斯宅邸,这是从前广州和香港商人颠地兄弟(兰斯洛特·颠地和威尔金森·颠地)在威斯特摩兰建造的一座宅邸。1839 年,中国当局威胁要拘捕兰斯洛特·颠地,引发了最终导致第一次英中战争*的事件。这场战争通常以“鸦片战争”而闻名,结果导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广州贸易大多转移到香港,颠地洋行成为这个新殖民地最有实力的商号之一。弗拉斯宅邸,连同内部保留下来的家具(德拉姆市古尔本吉安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中式大床值得一看),清晰地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那些“富商巨贾”的品位。弗拉斯宅邸有一些细节颇为有趣,这些细节表明了颠地洋行有别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怡和洋行的特征。与马地臣和三孖地臣在苏格兰高地建造的豪宅相比,弗拉斯宅邸显得朴实无华,体现了兰斯洛特·颠地更为严谨、较少浮夸的性格。弗拉斯宅邸的一些细部颇有特色,如手绘墙纸、乳白色的室内家具以及精致的意大利样式金属制品。宅邸向公众开放后,我们在肯德尔市阿伯特霍尔博物馆协助下,安排了关于对华贸易沿革的小型展览。我为这个展览撰写了一份简明指南,这份指南就是本书最早的雏形。

我想在此先做几点说明。不幸的是,任何关于英中两国关系的历史著述大都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之所以说是片面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位准备研究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和中文官方档案的学者,多半不会注意到 19 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微妙之处;而且学术界人士在研究这个殖民地历史中突出的商业问题时,势必会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若是不懂中文,就不得不依靠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翻译和节选出来的材料,本书作者就是如此。这样一来,除了可能存在的其他不足之处,本书的叙述不可避免地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要用一本书的

xii

* 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译注

篇幅涵盖如此宏大的主题,描述一个社会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势必要做一些乏味的概括,或是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问题的事件。为了避免平淡乏味的概括,我很遗憾地不得不省略许多相关材料,但我相信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至少能够在史料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香港的时局变化很快,由于写作与出版之间难免有时间间隔,我无法在本书中对这一间隔时期的时局变迁做出公正的评判。1991年3月到1993年3月的两年间,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国。不光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其他许多指标上,这个殖民地最终、或许是永久地、而且肯定是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高速度超越了“宗主国”。

政治的发展也很迅速,而且更为令人吃惊。1992年10月,香港总督决定以一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如果说以前曾经有过的话——运用王室特权。总督凭借一纸政令,改变了立法局的组织结构,以及立法局与行政局的平衡。这种情形如同一位斯图亚特王朝君主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力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虽然彭定康的动议强调了王室权力的权威性,但这项动议改变了香港宪政的发展方向。本来,宪政改革的方向是立法局民选议员进入行政局。彭定康先生的动议还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后果,那就是我不得不在结语中修订我对彭定康到来之前香港宪政体系的描述,以反映这些新变化。

xiii

我意识到本书的不足之处,愈加发自内心地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慷慨帮助的人士。英中友协的劳拉·里夫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托尼·法林顿、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使得我的北京之行成为可能。在北京,我得到了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和国家档案局外事办副主任沈丽华的帮助。他们慷慨而友好的帮助使我们能够鉴别一些重要史料,从而对19世纪40年代的英中关系有了全新的理解。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查尔斯·艾尔默承担了最为艰巨的任务,他准确地把手写体的中文史料翻译成英文。在香港,冼玉仪博士和陈刘洁贞博士在好几个问题上耐心指导我,张荣洋博士和普里西拉·罗伯茨博士不知疲倦地给予我殷情款待,并在从广州贸易到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问题上给予我指点。我感谢上述人士,感谢香港大学历史系的其他教员,尤其是Adam Liu博士,他毫无怨言地容忍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我还要感谢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副校监阿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爵士、迈乐文博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博士以及柏立基教育学院的院长和全体职员。在香港,我还要感谢卫奕信勋爵伉俪、翟克诚爵士、姬达爵士、马世民、吴应湘,尤其要感谢克莱尔·霍林斯沃思和莫里琳·赛宾。奈杰尔·卡梅隆、苏珊娜·霍伊、阿兰·伯奇等历史学家极为友善,他们关

于香港的知识远比我丰富。香港政府新闻处的马克·平克斯通和 Shirley Wong, 香港历史博物馆的丁新豹博士、政府文件处的 Thomas Lau 博士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我感谢马克·亨内克-梅杰、莱斯利·亨内克-梅杰以及菲利浦·沃克尔、玛丽·沃克尔, 他们为我引见了多位香港人士, 其中包括刘健仪议员、安格斯·福赛思、毕比·福赛思、彼得·卡尔顿、特丽西亚·卡尔顿。

回顾往事, 我意识到,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 与戈尔-布思勋爵、科林·克罗爵士、约翰·柯尔维尔爵士等睿智而渊博之人的交谈, 使我受益匪浅, 他们关于外交事务和威斯敏斯特的经验罕有其匹。我还要感谢约翰·佩奇、埃利奥特·肯达尔牧师、约翰·M. 斯各特、D. B. 埃利森、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的 M. J. F. 洛根夫人、罗伯特·麦克斯通·格雷厄姆、Yen Chung、詹姆斯·卡斯尔斯教授, 罗利画廊的乔纳森·萨维尔、雪莉·哈泽德(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夫人)、乔治·沃格伯、埃利·沃格伯、玛丽·特恩布尔、伦纳德·雷纳。

xiv

英国、香港、法国和美国的一些图书馆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对待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又几乎不懂电脑的研究者。我特别感激给予我很大帮助的香港驻伦敦高级代表约翰·亚克斯利, 代表处图书馆、厄休拉·普莱斯以及国家海洋博物馆图书馆尽心尽责的工作人员。我还特别感谢怡和洋行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档案资料。

感谢以下人士和机构允许我复制一些说明性资料: 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G. H. 克里准将、格林尼治国家海洋博物馆托管人、香港政府新闻处、大英博物馆托管人、伦敦威尔康姆学院图书馆、香港皇家警察队以及《南华早报》。马丁·格雷戈里画廊惠允我使用本书封面所使用的油画。

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会面临一个难题, 这就是中文姓氏的音译是采用威妥玛式拼音还是汉语拼音, 1985 年之前出版的著作通常采用威妥玛式拼音, 汉语拼音则是现在最普及的注音方法。读者接触到的英文历史著作, 包括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大多都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或是其变种, 因此本书关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所有参考资料采取这种拼音系统。另一方面, 当代中国人姓名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一些特殊的人物姓名, 如 Chiang Kai-shek(蒋介石)、Mao Tse-tung(毛泽东), 属于西方新闻界的习惯用法。这样一种折衷做法既避免了那种“愚蠢的连贯性”, 又可以方便编制和查找索引。为保险起见, 重要历史人物用两种拼音拼写。

香港的粤语姓名拼写尤为困难。在其出色的《香港社会的形成》一书的附录三, 陈伟群博士列出了至少 54 种不同的英文姓名拼写方式。除此之外, 有些



人士既有教名,又有中文姓名,显然很难采取一种统一的标准。

xv 另外一个特别容易造成误解的问题是香港的货币单位。银元是广州贸易使用的货币,香港用来作为通货,虽然交易记录的货币单位通常是中国的银两。殖民地早期账目的货币单位是英镑,从 1862 年开始,港币成为通行的官方货币单位,其价值随白银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1981 年,港币与美元挂钩,汇率是 1 美元兑换 7.80 港元。除非特别指明是美元,否则本书中的“元”均是指港币。如果需要与英国的情况做比较,有时会把货币单位折算成英镑。

以下一些度量衡也需要说明:

1 两等于英制度量衡的一又三分之一盎司;

1 亩约为三分之一英亩。

还要指出的是,在本书中,香港政府的二号人物和白厅的殖民地国务大臣通常都是用“Colonial Secretary”(译者按,中文版分别译为“辅政司、布政司”和“殖民地大臣”)。

目 录

序	1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1
第一章 两个帝国	
末代王朝 · 14 / 学者与士绅 · 22 / 东印度公司的崛起 · 25 / 不幸的航程 · 36	
第二章 鸦片生意	
使人快乐的植物 · 44 / 多变混乱的程序 · 53 / 我此生从未见过鸦片 · 57 / 一群花花公子 · 64 / 收入不错的行当 · 67 / 谁想打一场对华战争 · 74	
第三章 律劳卑勋爵的屈辱	
凄凉的墓志铭 · 80 / 第一个提议占领香港的人 · 87 / 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 91 / 最谦卑而顺从的仆人 · 96 / 兰斯洛特 · 颠地衣领之战 · 100 / 鸦片与威士忌 · 120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	
保护神 · 124 / 瞄准琉璃塔的大炮 · 139 / 南京条约 · 146 / 两个帝国的仲裁者 · 152	
第五章 贫瘠之岛	
“女王陛下的领地” · 159 / 璞鼎查时代 · 169 / 体面而富有的华人 · 178	



第六章 德庇时突袭

马丁的报告·182 / 刑罚·189 / 硫磺、树脂、啤酒和黑啤酒——还有鸦片·196 / 广州城里的是是非非·205

第七章 英法联军

名声不好的房子、台球厅和小船·215 / 庸医包令·223 / “亚罗”号事件·231

第八章 喧嚣与骚动

不顾一切的对抗·246 / 九龙半岛·259 / 殖民地部·265 / 汇丰银行·270 / 非法游戏·273 / 亲王来访·279

第九章 令人不快的话题

污水与肉刑问题·290 / 梅毒只能通过接触传染·299 / 总税务司赫德·304 / 来访者的评述·316

第十章 香港要塞

捍卫英帝国·320 / 法国的野心·327 / 萨金特将军的大炮·335 / 瘟疫·340

第十一章 香港殖民地的拓展

1895: 中日之战·356 / 无视法律的恶例·364 / 秘密社团的“恶棍首领”·380 / 弥敦爵士的铁路·387

第十二章 香港与中国革命

恶毒的议员·393 / 爱国的通奸行为·398

第十三章 动荡的局势

冷若冰霜的面孔·422 / 为什么必定会发生对日战争?·436 / 妹仔·443 / 蹒跚走进20世纪·449

第十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可耻的默许·454 / 大难降临·460 / 我们现在自由了·468 / 英帝国被一笔勾销了·474 / 英国选民根本不在乎香港·486

第十五章 在夹缝中生存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态度·494 / 金钱至上·513 / 毛泽东的变革计划·519

第十六章 黄金时代

麦理浩走马上任 · 529 / 司空见惯的腐败 · 542 / 华人社会 · 546

第十七章 退场

香港的前途 · 555 / 直接选举问题 · 567 / 破旧的帝国背包 · 570
/ 殖民主义的终结 · 581

尾声	586
附录一 历届英国政府与中国的重要人物	589
附录二 历任香港总督	594
参考书目	596
索引	620
译后记	678

前言：不情愿的双亲

1

香港,这个维多利亚朝英国与大清中国的“私生子”,自1842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以来,就一直令其创始人烦恼和为难。起初,双方都不准备承认这个婴儿。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巴麦尊更倾向于获取更多的现款,或是更大、更富庶的舟山,为此他马上解除了负责谈判割让这个荒凉岛屿的全权公使的职务。不过,维多利亚女王倒是因为自己年幼的女儿有可能成为“香港公主”而欣喜不已。至于中国道光皇帝,在英国皇家海军军舰上瞄准南京城墙的大炮的威慑下,他被迫承认治下的领土丧失了弹丸之地,迄今为止他对这个岛屿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对整个事件困惑不已。在道光看来,这些夷人惟利是图,获取土地也非出自长远之见,“该夷性等羊犬,不值与之计较”。^①

香港从其开埠之日起就与臭名昭著的鸦片走私贸易关系密切,因而声名狼藉。从那时起直到现在,香港不时给英国带来麻烦,涉及鸦片、卖淫、赌博、鞭刑、贪污等一系列丑闻,总督、官员、政府部门与侨民不时爆发争执,时至今日,白厅仍不得不面对这些丑闻和争执。

对于中国而言,失去这个岛屿自非所愿。虽然香港只是这个庞大帝国末端微不足道的一隅,但对于中华帝国的人民和统治者而言,它始终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尽管外国人占据的另一个更无足轻重的地方——葡萄牙人的澳门居留地,有400多年未受触动,但问题是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方式令人恼怒不已。香港的割让直接起因于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决定性地、迅速地败下阵来。香港割让之后,外国政府开始日益贪婪地攫取领土和贸易特权,到19世纪末,给中国带来了一连串战败、外债和屈辱。围绕这第一次外来入侵,已经产

2

^① 巴麦尊致义律函,1841年4月21日(Palmerston, private letter to Charles Elliot 21 April 1841)。维多利亚女王1841年4月13日函,载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Queen Victoria, letter of 13 April 1841, Queen Victoria, *Letters*, vol. I)第261页以下。道光皇帝语,请见佩里瑟尔:《觉醒的中国:1793—1949》(R. Pelissier, *The Awakening of China 1793—1949*),第90页。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女王。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迅速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张照片摄于1844年,是现存最早的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照片。

生了许多神话,香港居民为此背上了沉重的感情负担。人们认为,既然香港的割让导致了外国劫掠,那么1997年的回归则标志着屈辱的终结。因此,这个殖民地的历史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对华态度的演变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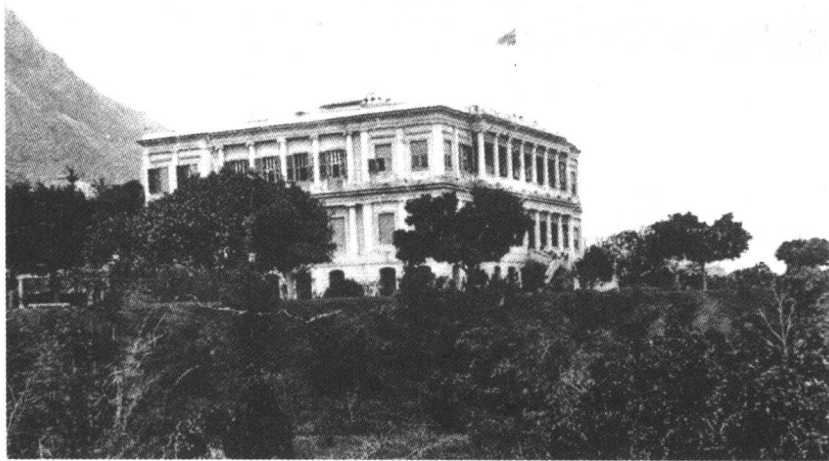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视为不可救药的邪恶,民主被当成包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的时代,香港的状况却有悖常理。这个直到最近还没有任何民主机制的殖民地日益繁荣,成为一个生活宜人的乐园。有人预料,这个弹丸之地将在经济上超过中国(内地)——人口的迅猛增长和不时出现的不当政府阻碍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发展。即使是与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其他“亚洲小龙”相比,香港也毫不

逊色。香港在贸易上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同样成功,在保护个人自由方面则做得更好。与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香港相当好地控制了腐败,在这个不民主的直辖殖民地,没有民主化的新加坡所施行的种种琐碎限制(例如,新加坡明令禁止留长发、嚼口香糖)。

不仅如此,香港比英国更成功。在过去10年里,香港保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率,香港与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80年的10%上升到1990年的超过85%。实际上,早在1981年,香港就在平均寿命等重要指标上超过了英国(男子平均寿命是72.4岁对71.1岁,女子是78.1岁对77.1岁)。

3 将英国管治的香港与美国管理的领地波多黎各作个对比,就能更好地说明问题。波多黎各有400万人口,与香港的600万人接近;自1898年以来,波多黎各一直处于美国控制之下,这与英国控制香港绝大部分地区的时间差不多。波多黎各确实有更为民主的制度,那里的总督和政府均由民选产生,美国仅掌握外

交和国防政策的控制权,但在绝大多数方面,香港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婴儿死亡率在波多黎各为 16‰,香港仅有不到 7‰(香港的这个指标甚至低于美国的 10‰)。今日香港人的平均寿命为 78.3 岁,高于波多黎各的 73 岁(也高于美国的 74 岁)。其他生活水准指数,犯罪率、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新闻报刊数量、非婚生子女、公共交通质量、免费医疗等等,香港也都走在波多黎各的前面,在一些项目上更是大大领先,同时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例如,香港谋杀案发案率为每 10 万人 1.64 次,美国高达 7.91 次。^①



这座建筑是昔日香港总督的办公室和官邸,始建于 1851 年,历时 4 年竣工。建筑物曾经历多次大规模修缮,最后一次是 1942 年日占时期。

今日香港已找不到多少殖民地的痕迹,而殖民地过去的标记几乎早已荡然无存。太平山的山坡下,高耸的摩天大楼遮住了过去殖民地的中心:总督府,类似于一座日式火车站;圣约翰座堂,一座平淡无奇的哥特式殖民地建筑;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旗杆屋,以前是驻军总司令讲究的官邸,他曾在此自豪地眺望停泊在港口的那些闪耀着灰色光泽的中国舰队巡洋舰。如今,从希尔顿饭店的房间和中银大厦的办公室,仍可以看到这些帝国时代的遗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占领时期,总督府可笑地按照日式风格进行了重修,包括新建了一座与四周建筑不协调的神道教样式的塔,之后便再也没有翻修过。圣约翰座堂在同一时期遭到劫掠。旗杆屋是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建筑,如今是收藏和展

^① 《联合国人口统计分析》、《美国政府报告》、香港政府新闻处 (United Nations Demographic Analyses; US Government report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epart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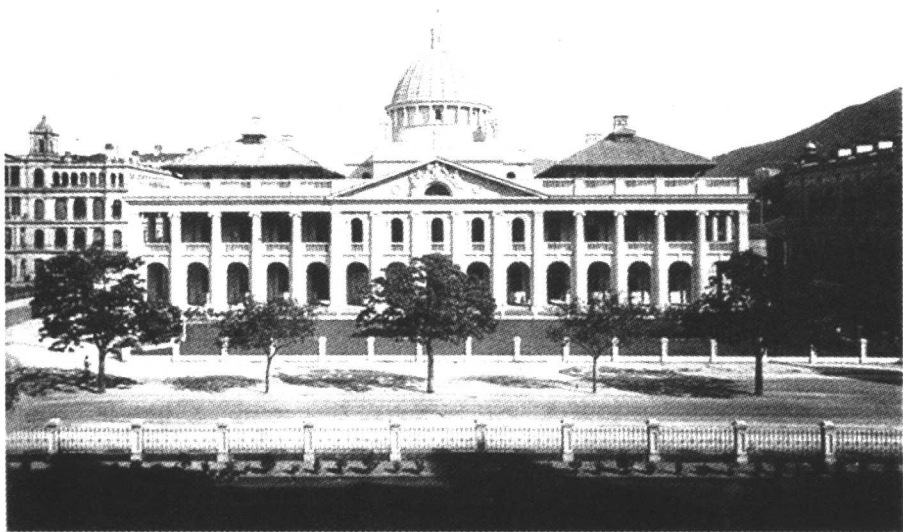


建于1846年的三军司令官邸是香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建筑。图为1930年的驻港英军总部大楼。

览茶具的文物馆。皇后像广场已经找不到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那里仅存的雕像是一位银行经理的雕像,这与这个商业之都的氛围完全吻合。英国国旗第一次在这个殖民地升起的地方位于现在的水坑口街,但早已无迹可寻。庆祝英占香港150周年的动议,因公务员的强烈抗议而不得不作罢。

在香港街道上,除了警察——几乎全都是华人——之外,看不到任何身着英式制服的人。惟一能够见到的英国士兵是添马舰海军基地入口处的水兵,平时守卫的舰艇充其量是三引擎巡逻艇,除非有其他军舰来访。香港也找不到多少经济帝国主义的痕迹。人们有理由期望政府办公楼的停车场至少会有一些本地生产的汽车,但那里只有丰田和其他品牌的日本汽车;高级公务员可以配备奔驰车,只有总督本人才有一辆劳斯莱斯汽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醒目的帝国象征日渐消失。1950年,英国政



图为原最高法院大楼,1912年1月15日由时任总督的卢押宣告正式启用。

府派出相当于两个满员师的军队警戒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年,总督府门外聚集了成千上万示威者,担任警卫的却只有孤零零的一名英国士兵。当时,香港依然能够看出过去一个世纪的模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殖民地,板球场占据着市中心,阿斯顿·韦伯爵士设计的最高法院大楼守望着市中心,背景则是汇丰银行的艺术装饰。在码头区,新建的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周围建筑物的衬托下显得鹤立鸡群。在湾仔,警署直接守卫着港口。

时至今日,法院大楼保留下来,现在是立法局和行政局办公楼,板球场已经不见了,汇丰银行里外一新、富丽堂皇的新总部大楼蜷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的标志性象征中银大厦旁边。在周边高耸林立的办公大楼映衬下,面目全非的文华大酒店和老态毕露的香港大会堂显得十分矮小。围海造地使湾仔的陆地向前伸展了将近四分之一英里,一座亚洲最高建筑正拔地而起。站在九龙眺望,过去维多利亚城的地平线每周都在发生变化,但依然是香港最壮丽的景象,从港口直到太平山雾气蒙蒙的山坡,到处耸立着密密麻麻的宏伟建筑。

从九龙眺望内陆,可以看见新界那些在17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新城镇,荃湾和屯门的居民区居住着大约30万人。今天,有200多万人生活在各个新城镇,明亮清洁、便捷高效的地铁和现代化铁路把这些新城镇连接起来。老社区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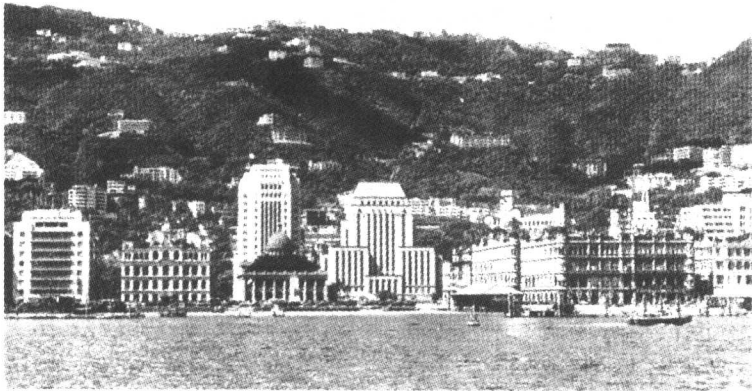


1970年,从太平山眺望港湾,希尔顿酒店的高度还超过汇丰银行大厦。文华大酒店和香港大会堂在图片的中左侧。



仅仅20年之后,从同样的角度望去,香港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图中深色的高大建筑是中国银行大厦,总督府已完全被林立的高楼遮住。

保留了高层住宅群,沙田已经成为最大的居民区,拥有两所大学、一座新建的跑马场、一家音乐厅以及一个 50 万人口城镇所能拥有的各种便利设施。



图右侧的汇丰银行大楼成为最高法院(图中央濒水的圆顶建筑)以及其左侧的香港俱乐部和板球场的背景。

站在地平线上远眺,香港就像一个更加多姿多彩的曼哈顿,若是在街道上四望,香港显然是一座中国城市。即使是西方游客和商人密集的中环以及新兴城镇——那里很少有大幅的涂鸦,像广州或上海一样来往的人群中仍多为中国人。然而,香港的人口来自天南海北。除大众已经接受的印度人和葡萄牙人社区之外,香港人口主要是广东人,还有 50 万人从中国内地来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寻求安全与



40 年之后,同样的地点,上一张照片中只有一幢建筑还依稀可辨。高耸的中国银行大厦位于图片的中央,其高度远远超过了右侧的汇丰银行新大楼。

财富(中国大陆地区对香港的状况颇为自豪)。中国内地山东或四川的农民游览北京后,会带回去一些印有香港奇异风光和北京天坛的明信片。不过,他们只能凭想像去领略各种不同文化奇特融合所产生的时尚、活力与热情。只有亲身体验香港的生活,深入到街道上全神贯注、行色匆匆的人流中,到各个企业的办公室——正是这些企业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才能真正感受这种时尚、活力与热情。

要想说明香港的发展,必须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欧洲大陆和中国的政治史,因为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决定性地影响着香港的发展进程。当代中国学者在分析他们国家的这一段敏感历史时期时面临很多困难。共产党中国在过去 15 年来取得的成就^①,尤其是与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混乱相比,已经激发起一种一直潜伏着的沙文主义。质疑政权的那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命运,阻碍了人们流露出批评的倾向。直到最近,人们才能够表达一些立场不那么鲜明的观点,而其他严肃历史学家依然把严格遵循事实指责为“历史研究中不可取的实用主义”。^② 国家掌握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通常从帝国主义剥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历史时期。

中国的确遭受了最无情的剥削,但那是在 19 世纪晚期,而且最穷凶极恶的剥削者不是欧洲列强,而是中国过去的藩国日本。英国攫取香港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法国或德国式的扩张主义强国。在这个殖民地的形成年代,英国的舆论和政策正处于发展阶段,威斯敏斯特的政府更迭频繁,还时常伴随着党派重组,托利党发展成保守党,辉格党发展成自由党。^③ 英国历届政府总是与大多数阶层的公共舆论唱反调,经常不赞成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所采取的行动,并且无一例外地更关注决定大选成败的国内事务而不是殖民地问题。直到 19 世纪末,英国公众舆论才变得比较好战,对殖民战争表现出一定的热情。即使是这种支持殖民战争的倾向,也因帝国军队在布尔战争中的恶劣表现和自由党重新执政之后迅速削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交部许多高层人士把香港视为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的障碍,极力要求把这个殖民地归还给中国,这样一种观点从来就没有

① 本书写于 1993 年,此处的时间指改革开放的 1978 年以来的 15 年。——译注

② 贾庆国的论文出色地分析了中国学者在决定“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位学者”问题上的困境。贾庆国:《理智与情感之间》,载罗伯茨:《1900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Jia Qing-kuo, 'Between Sentiment and Reason', in Robert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00*)。

③ 见附录一,1830 至 1993 年的英国历届政府。